

李金坤 著

風騷比較新論

江西人民出版社

此书名由王运熙先生题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骚比较新论 / 李金坤著.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12

ISBN 7-210-03304-1

I. 风… II. 李… III. ①诗经 - 文学研究②楚辞 - 文学研究 IV. I 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8329 号

风骚比较新论

李金坤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南昌市印刷十六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350 千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10-03304-1 / I · 435

定价: 25.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 6898827 电话: 6898893(发行部)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李金坤，1953年生，江苏金坛市人。系北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江苏太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教二十余年，在《文学遗产》、《文献》、《文史知识》、《中国文化研究》、《学术研究》、《人文杂志》、《诗经研究》（韩国）、台湾《经学研究》、香港《亚太语文教育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参著二十余部，计三百万字；获国家、省、市各级社科论文优秀成果奖二十余项。

至坤回字留念

君治詩騷丹博超芳
書云心心我共推教
百寓集九月

昌史
休心
昔年九月
休心沈明海院

序

褚斌杰

《诗经》和《楚辞》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大典范作品，是风骚传统的源头，两千多年来，对中国文学以至中国文化均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因此，加强对《诗经》、《楚辞》及二者的比较研究，发掘其思想与艺术之精华，是十分必要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受邀在中央电大主讲《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课程，其时李金坤君在江苏某县城任该课程辅导教师，李君教学认真，一丝不苟，每遇问题，即飞函相问。九十年代年末，李君负笈北上，来北大随我作访问学者，研修先秦两汉文学，遂有识荆之雅与论学之乐。访学期间，李君心无旁骛，选课（共选修硕士、博士课程十余门，远远超过规定要求）、读书、听讲座，广采博纳，全力“充电”，诚笃敦厚，勤勉好学，并着手从事《诗经》与《楚辞》的比较研究。今天李君著成《风骚比较新论》一书，并得到江苏省教育厅社科基金的资助，正是其辛勤汗水浇灌之硕果，我由衷祝贺，并乐为之序。

“诗经学”与“楚辞学”向称显学，历代研究硕果累累，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更有超越前人的贡献。但是，对于《诗经》与《楚辞》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还有很多深入的空间，随着郭店楚墓等大量儒家经典竹简之出土，儒家文化在南楚的传播问题更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李君在中原文化与南楚文化交融的

大背景上重新审视《诗经》与《楚辞》之关系,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像李君将《风》与《骚》作系统整体研究并撰成专著者,目前尚未幸见。李君此项研究是甚有学术价值与意义的。

李君《风骚比较新论》一书,有很多新颖的观点,如第六章对屈骚作品中山水景物所具有的“感伤性色彩”、“游览性特征”、“亲和性情感”与“虚幻性手法”等审美价值之归纳,新人耳目。第七章中作者将自然生态学引入《风》《骚》比较研究,以博物学的功能符号、社会学的文化符号、文艺学的情感符号、教育学的启蒙符号等全面审察《风》《骚》自然生态之意义与价值,对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诗论做出了全新之诠释。另如第八章指出“《楚辞》比起《诗经》龙凤单独描写的情形和注重实用的艺术特征来,则更表现出龙凤对举综合叙写与浸染南方巫文化色彩的浪漫主义特征。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龙凤文化,正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产物,是一种兼容并包、别开生面的新文化”;又如《小雅·采薇》末章“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王夫之认为是“哀景写乐”,而李君认为是“哀景写悲”;朱自清将中国诗歌中“咏史”、“游仙”、“艳情”、“咏物”四类比体诗的源头定在“王注《楚辞》”,李君认为其真正源头在《诗经》,等等。这些论述,能突破陈说,发表新见,可为一家之言,为此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式。

李君《风骚比较新论》一书在体例和研究方法上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全书洋洋三十五万言,由正文十二章与附录八篇论文组成,前三章集中阐论《风》《骚》关系之文化背景,由远而近,层层论析,为《风》《骚》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承上启下,就《风》《骚》“文学精神”、“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之种种异同作宏观论述,为以下八章详论《风》《骚》中之忧患意识、山水美意识、自然生态意识、龙凤文化、梦幻文化、弃妇情结、体制特征、比兴艺术等审美价值做了最好准备。附录八文,就《风》《骚》比较的相关问题或评或考,或论或赏,精探细研,是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全书主要

运用比较研究法,对《风》《骚》的文化背景、思想意识、诗歌体式、表现手法等进行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化、综合性比较研究,由此窥见《楚辞》对《诗经》的传承之脉与演进之迹。作者又能结合宏观与微观,考与论,用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民俗学、宗教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及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等多学科知识,系统观照与研究《风》《骚》比较之诸问题,这些正体现了李君学养厚重、视野开阔、思维敏捷、方法灵活的良好科研素质。

李金坤君正值盛年,且有幸于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勤学不已,精进不怠,精神可嘉。我深信,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李君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2005年11月于北京西三旗育新花园

(褚斌杰先生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会长。)

目 录

序·····	褚斌杰(1)
--------	--------

导 论·····	(1)
----------	-----

第一章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14)
-------------------------	------

“风骚”释名——南北文化之异质——文学之异——绘画之异——书法之异——舞蹈之异——地理环境之异——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南北文学异质兼融理论之提出——魏徵《隋书·文学传序》——江左“清绮”与河朔“气质”之融合的实践性——《楚辞》：兼融南北文化之长的新诗体——“风骚”研究之意义

第二章 楚辞文化渊源综论·····	(30)
-------------------	------

楚辞文化：复合型之多元文化体系——北方文化影响说——南方文化影响说——南北方文化交融说——四方文化聚合说——泛太平洋文化影响说——南楚巫文化与战国士文化融合说——诸说各有优劣——相对而言，南北文化影响说较为切近《楚辞》文化实际

第三章 中原文化影响楚文化六论……………(59)

楚、夏同源,以属诸夏——北人南下的文化传播——楚人与中原儒家经典的情结——楚地出土文物与中原文化——楚与中原制度文化及方言现象——楚与中原的龙图腾及其文化习俗——中原文化影响楚文化源远流长

第四章 《风》《骚》承传关系论略……………(78)

文学精神——“怨刺”风格——忧患意识——袭用四言形式——化用《诗经》诗句——引用《诗经》典故——赋、比、兴——《诗经》之外的其他文化——战国诸子散文——楚歌、巫歌、楚声——南方文化是其表——北方文化是其骨——《风》《骚》承传关系毋庸置疑

第五章 《风》《骚》忧患意识原论……………(88)

《诗经》时代社会动荡,世乱时乖——劳作之苦,徭役之痛,战争之悲——“我心忧矣”,“莫知我哀”——《国风》《小雅》多忧患语——《楚辞》中屈原愤党人、群小构陷,怨楚王不聪——悲伤恐惧之字眼触目皆是——诗人恐时光流逝、功业未成,哀国祚日短、焦灼万分——《诗经》《楚辞》共同奠定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第六章 《风》《骚》山水美意识演进论……………(131)

《诗经》山水审美意识——敬畏山水等自然之神——以山水景物作比兴之材料及愉悦对象——景真实而语简朴——《楚辞》对山水等自然之神的亲和感与热爱感——山水景物描写多呈感伤性色彩——象征意味浓郁——情景交融增多——《楚辞》山水审美意识更强——山水审美自觉性更高——诗歌艺术境界更宽——为迎接山水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较为丰富而宝贵的创作经验

第七章 《风》《骚》自然生态意识发微·····(150)

《诗经》中的鸟兽草木虫鱼——博物学层面的功能符号——社会学层面的文化符号——文艺学层面的情感符号——教育学层面的启蒙符号——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深层内涵——《楚辞》名目繁多的香草世界——客观反映楚人以香草祭鬼神的好巫之风与祭祀风俗——体现楚人爱美的良好风尚与以香花传情达意的理想恋爱方式——象征屈原洁身自好的美德与情操——象征辛勤培育的人才——神话与幻想世界中的山川地名、种种物象——浪漫主义风格特征——《诗经》自然生态的现实性——《楚辞》自然生态的虚幻性——《诗经》人与物、情与景单一对应之表现——《楚辞》人与物、情与景重叠错综之关系——《诗经》物质生活层面与精神生活层面兼而有之——《楚辞》多倾向于精神生活层面——《风》《骚》自然生态意识的现代意义

第八章 《风》《骚》龙凤文化寻踪·····(205)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诗经》龙、凤多单独描写——《楚辞》龙、凤多对举描写——《诗经》《楚辞》龙、凤意象皆具比兴象征意义——《楚辞》含有丰富的南方巫文化神秘色彩——北方“旱粮文化”——降雨之神的龙——北方民族崇拜的图腾——南方“水稻文化”——作为报农时的布谷鸟之类——知物候的天神使者——虚拟为凤鸟——南方民族崇拜的图腾——《风》《骚》共同奠定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第九章 《风》《骚》梦幻描写审美·····(215)

《诗经》为梦幻文学的最早源头之一——梦幻描写简朴单一、艺术空间、所取素材有限——开创之功不可没——《楚辞》梦幻描写趋于繁富细腻，素材丰富——艺术表现空间阔大，场面壮观——《诗经》梦幻描写多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呈现鲜明的功利性——《楚辞》梦幻描写多具超现实的神秘性特征——浓厚的“梦魂说”观念——浪漫主义文学的表征——梦幻文学史的先河

第十章 《风》《骚》“弃妇情结”探赜……………(229)

《风》《骚》“弃妇情结”——同中有异——承继发展——表现手法——托寓寄情——意志情感——心理刻画——结构安排——形象塑造——情景结合——语言描写——由简至繁——由浅入深——由实而虚——“弃妇情结”之表现传统——开启后世悲士不遇文学主题之新径

第十一章 《风》《骚》体制异同论……………(251)

篇章体制:《诗经》短小——《楚辞》宏大——形式对称——意念对称——对答之体——句式体制:《诗经》四言为主,间以杂言——《楚辞》六言为主,间以四言、五言——“兮”字之别——韵律体制:《诗经》用韵位置——用韵疏密——用韵格局——用韵关系,大多固定——《楚辞》全篇浑然一体,然有“节”可循,有“韵”可寻——韵位、韵变灵活多样——部分诗篇押韵到底——多用高呼度韵脚与鼻音韵尾韵脚——内容体制:《诗经》风、雅、颂——特有的内容体制,以音乐为划分标准——《楚辞》隐形的风、雅、颂体制特征——《风》《骚》体制相沿,有迹可寻

第十二章 《风》《骚》比兴艺术演变论……………(279)

比兴艺术手法为《诗经》所创——《楚辞》踵事增华——《诗经》之比兴多为单一而孤立的客体——《楚辞》之比兴多主客体吻合——《诗经》之比兴多呈现零散而片断的表现形式——《楚辞》之比兴多集中而系统地体现象征意义——《诗经》比兴的思维过程通常是从外到内,触物生情,具有被动式的抒情特点,比兴多呈客观性——《楚辞》比兴思维过程则是由内而外,其表现形式多为托物寄情,具有主动式的抒情特点,比兴多呈主观性——《诗经》比兴多在开头——《楚辞》不拘位置,全篇皆可——全面借鉴——楚文化陶冶——江山之助——艺术思维的巨大飞跃——开创“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比兴艺术新境界

附 录

一、刘勰《诗经》观平议·····	(295)
二、刘勰《楚辞》观简论·····	(315)
三、《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论·····	(326)
四、释“复关”·····	(341)
五、《硕鼠》并非祈鼠的祝词·····	(346)
六、《硕鼠》终究不是祈鼠的祝词·····	(350)
七、关于《诗经·颂》诗评价的几个问题·····	(361)
八、“杨柳”牵别情 “雨雪”添哀思·····	(372)
主要参考文献·····	(378)
后 记·····	(386)

导 论

-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
-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五
- 《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陆游《哀郢二首》
-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台湾诗人余光中为屈原而作
- 蓝墨水的最早源头是黄河——笔者为《诗经》而拟

拙著《风骚比较新论》撰事既竣，总览全书，于心微安；却顾来路，百感犹生。兹拈出三点，权作导论，以冀学界同仁与读者诸君“一苇杭之”，由此窥察作者“为文之用心”也。

一、撰写缘起与研究意义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文学的优秀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体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实乃南方文学的卓异范本。前

者是黄河流域地区中原文化的缩影,后者是长江流域南楚文化的精华。《诗经》与《楚辞》以其自身杰出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于中国文学的源头,共同铸就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的两座丰碑。《诗经》与《楚辞》奠定的优良“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

“风”“骚”传统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题材而言,《诗经》中就有祭祀诗、宴饮诗、咏史诗、咏怀诗、农事诗、战争诗、怨刺诗、爱情诗(闺思诗、弃妇诗、悼亡诗)、送别诗、禽言诗、怀乡诗,等等。《楚辞》中除了《诗经》中的部分题材外,还有屈原《离骚》的自传体诗、骚体诗、宋玉《九辩》的悲秋诗,等等。可以说,后世诗歌所表现的题材类型差不多都可在《风》《骚》中找到它们的母题。就体式而言,《诗经》的四言诗,已成为一种固定的诗体沿用至今;杂言体对汉乐府及其后来的拟乐府与古诗都有较大影响。寓含于《诗经》“风、雅、颂”中的“美刺”传统,已成为历代诗歌创作内容的主要特征。《楚辞》六、七言诗体,对我国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而《诗经》的四言句式与《楚辞》的六言句式,又共同孕育了后来的骈文及骈赋“四六”句式的新的句种。就艺术而言,《风》诗所创立的赋、比、兴艺术表现手法,对《骚》辞的铺陈描写,汉赋之产生,以及中国诗歌意境论的出现,都有重要的导引和诱发作用。此外,还有对比、夸张、顶针、层递、排比、借代、对偶、呼告、委婉、警策等修辞手法,都无不给后世文学以重大影响。《骚》辞所开启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更是成为后世作者乐此不疲的艺术瑰宝。就精神而言,《风》《骚》的忧患意识,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的积极态度,勇于涉世、批判现实的主人翁精神,以及“乐土”和“美政”的崇高理想,等等,这些都无不给人以极大的鼓舞、教育和启发意义。这里应特别提出的是,《风》诗所积淀的“风雅传统”,以及在其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汉魏风骨”(亦称“建安风骨”)。每当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出现脱离现实、片面追求形式主义、唯美主义颓靡文风的时候,有识之士便自然会高举起“风雅传统”与“汉魏风骨”

之大旗,拨乱反正,使文学创作重新走上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至于屈原那“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真理的精神,“虽体解吾犹未变”的顽强无畏的精神,“伏清白以死直”的好修自洁的精神,以及“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赤诚爱国的精神,这些伟大的“屈原精神”,两千年来不知感动、激励、鼓舞过多少仁人志士,从而使他们甘愿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复兴奉献一切,在所不惜。“屈原精神”与“鲁迅精神”这两具伟大的“民族魂”,前后映照,激励人生。

总之,《风》与《骚》所交汇而成的“诗言志”的抒情传统,忧国忧民的讽谏传统,赋、比、兴的艺术思维传统,《风》之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与《骚》之务“虚”的浪漫主义创作传统,对推动和促进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世一切文学作家与作品,尤其是杰出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家与作品,无不沾溉“风”“骚”传统的雨露,沐浴“风”“骚”传统的光辉。酷爱屈原及其作品的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说得极好:“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这正是对“风”“骚”传统哺育中国文学的伟大功勋最为形象而绝妙的概括,亦是最为至诚而至当的赞颂!

“风”“骚”并称始于西汉,这个传统命题迄今已延续二千余年矣。对于《风》与《骚》之间关系的认识,历来多有分歧。归纳言之,约有三说:一是“肯定关系”说。此说之发轫者为西汉淮南王刘安,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又进一步加以论说,至南朝时定型。以后代有赞同者。二是“否定关系”说。此说由东汉班固首次发难,北齐颜之推臻其极。至今,仍有不绝于耳的附和之声。三是“折衷关系”说。此说提出者是齐梁时期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专列《辨骚》篇,并将其置于“文之枢纽”的重要地位。指出屈骚有“四同”于《风》《雅》者与“四异”乎经典者。此说具有辩证的学术眼光与文学批评的“当代性”意识,故较为切合《楚辞》实际,后人多有附议发挥者。正因为学术界对《风》《骚》之间有无承传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势必要影响作为“显学”的“诗经学”与“楚辞学”的深入

研究。综观历代《风》《骚》研究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作者、作年、词义、题旨、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等方面的考论。而今部分学者又开始关注文化与美学价值方面的探究。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风》《骚》比较研究仍然处于“寂寞江湖冷”的尴尬境地。至于将《风》《骚》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专著,尚未曾寓目。这种情形与《风》《骚》这两座丰碑的伟大地位与深远影响甚不相符。可以说,在中国文学“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百花园地里,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能像《风》《骚》这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文艺生活、日常生活等方面,人们都离不开《风》《骚》。即使连人名、书名、店名等的命名,人们都少不了要到它们中间去寻觅美好而吉祥的字眼。因此,《风》《骚》比较研究如此沉闷而孤寂的局面不应当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们应当有一个突破,一个具有充分理由与可行性条件的突破。

其实,后起于《风》诗二百余年的《骚》辞,它是楚文化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而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早就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作为楚文化代表的《骚》辞必然要受到中原文化的代表《风》诗的影响。这在《左传》、《国语》、《孟子》、《离骚传》、《史记》、《楚辞章句》、《文心雕龙》等诸多文学典籍,尤其是解放以来不断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儒家典籍文物中,更是充分证明了《风》与《骚》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著名楚辞学专家姜亮夫先生从研究屈原生平事迹及其作品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历经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坚信“屈原肯定读过《诗经》”^①。李诚先生亦认为,《骚》与《诗》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骚》对《诗》的直接文学继承,是毋庸置疑的”^②。徐志啸先生通过《风》与《骚》中具体文词与句式的内在联系、前贤所论以及屈原在朝廷的地位等诸种因素的比较分析,亦坚定指出:“毫无疑问,作为‘博闻强志’的屈原,在‘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时,决不可能不沾溉‘风’‘雅’,这是屈原创作楚辞接受《诗经》影响的先决条件。”又指出:

①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修订本)》,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②李诚:《诗骚异同简论》,《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